

跨境并购能否促进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

卞雨晨

(南京审计大学 金融学院, 江苏 南京 211815)

摘要: 本文基于 BVD-Zephyr 全球并购交易数据, 以 2011—2023 年 A 股上市企业为样本, 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对跨境并购与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关系进行揭示。研究发现, 跨境并购能够促进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 该影响主要来自技术寻求型跨境并购和跨行业跨境并购。机制检验发现, 增加国际创新合作和提升组织韧性是跨境并购促进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主要机制, “引进来”政策的实施会增强跨境并购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 跨境并购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主要存在于内部控制质量较好、供应链集中度较高和垄断力量较弱的企业。本文研究以跨境并购为切入点, 丰富了新质生产力的研究视角, 对企业通过跨境资源整合实现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一定的政策及实践启示。

关键词: 新质生产力; 跨境并购; 国际创新合作; 组织韧性; “走出去”; “引进来”

[中图分类号]F273; F279; F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034(2026)04-0039-18

引言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深入发展, 新兴技术不断涌现, 重塑了全球竞争格局。在这一时期, 简单依靠要素投入与规模扩张带动的传统发展模式不再适用, 以新动能重构增长内核成为保持大国竞争优势的关键举措。对此,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更是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列为坚持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一环, 这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奠定了基调, 也为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初始阶段的战略部署指明了方向。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驱动力(任保平, 2024)。为了实现技术追赶, 中国长期以来采取“引进—模仿—超越”的技术发展模式。但随着西方国家“产业脱钩”等政策不断扩散, 国际资本对华投资增速开始下降, 通过跨境资本流动构

[收稿日期]2025-07-17

[作者简介]卞雨晨(1996—), 男, 江苏徐州人, 南京审计大学金融学院讲师, 博士, 研究方向: 国际金融、跨国公司治理

建的技术引进渠道被阻断,这使得大量仍处于创新模仿阶段的产业面临关键技术“卡脖子”的困难处境(于英杰等,2024)。在这一局势下,中国亟须寻找一条新的技术发展路径,以此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从而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为了鼓励企业“走出去”,主动与国际机构开展投资、贸易、技术等领域的合作,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党的二十大则强调,要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可见,通过“走出去”吸收和引进国际先进技术或将成为突破大国技术封锁进而实现新质生产力跃升的破局之计。

跨境并购是企业“走出去”的典型方式,是指企业对注册地在中国大陆境外企业的兼并或收购行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跨境并购无论是频次还是参与企业数量都出现了明显增长,表明中国市场开放模式已由“引进来”为主向“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转变,意味着跨境并购已经成为中国企业进行国际资源整合的重要途径。通过跨境并购,企业能够直接吸收被并购方的技术、人才和研发体系,从而能够在短时间内突破技术瓶颈,快速、高效地实现技术跃迁(吴先明和苏志文,2014;Yang等,2025)。因此,跨境并购可能是促进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途径。

“十五五”时期中国具备主动运筹国际空间、塑造外部环境等诸多有利因素。这一时期将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窗口期,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厘清企业跨境并购的经济效应,这将有助于对中国双向开放的经济效能进行阶段性评估,从而为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格局并以此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献言献策。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本文基于BVD-Zephyr全球并购交易数据,以2011—2023年A股上市企业所完成的跨境并购案例为基础,构建了一个准自然实验,结合倾向得分匹配方法与双重差分模型(P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Difference in Differences, PSM-DID),就“跨境并购能否促进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这一议题展开系统性探讨。

相较现有文献,本文边际贡献包括:第一,当前有关市场开放与企业新质生产力关系的研究主要围绕中国市场对外开放展开(陈邑早等,2024;吴开亚等,2026),仅有刘海月等(2025)基于企业OFDI视角就“走出去”能否提升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进行了探讨。本文首次从跨境并购视角进行研究,因此从市场开放层面丰富了企业新质生产力影响因素的理论和文献,对借助企业海外投资布局发展新质生产力具有一定实践启示。第二,传统的资源基础理论强调企业资源在构建竞争优势中的重要性,但忽视了资源的形成过程。本文从国际创新合作和组织韧性视角探究了跨境并购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赋能机制,有助于理解企业如何通过跨境资本运作实现国际资源整合,对从静态视角探究资源存量与企业生产力关系的研究进行了拓展。第三,有关企业“引进来”与“走出去”的既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对两者互动关系的探讨(李磊等,2024),但对两者的协同赋能效应揭示不足。为了填补这一研究的不足,本文还以企业新质生产力为落脚点,将企业“引进来”与“走出去”纳入同一研究框架,针对企业“引进来”政策的实施是否能够增强跨境并购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促进效果进行验证。这为政府部门通过设计双向市场开放的政策,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与经验证据。

一、文献回顾

新质生产力的概念一经提出便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并形成了一系列理论研究成果: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主导、以实现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突破而产生的生产力(周文和许凌云,2023);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遵循经济社会发展的科技创新规律、结构演进规律和市场经济运动规律(刘伟,2024)。基于新质生产力的理论解析,利用实证工具探索新质生产力发展驱动因素的文献也逐渐丰富,其中与本文相关度较高的是从市场准入放宽(陈邑早等,2024)、制度型开放(吴开亚等,2026)、境外耐心资本持股(卞雨晨,2026)等视角探索市场开放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赋能作用的文献。而在企业主动“走出去”方面,企业 OFDI 也被证明能够促进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刘海月等,2025)。

与本文相关度较高的另一支文献是与跨境并购创新驱动效应有关的研究。跨境并购被证明能够促进知识与技术资源的跨境获取(Cheng 和 Yang, 2017),并推动企业增加研发投入(余鹏翼等,2022),是企业摆脱创新“质”“效”双低的有效途径(臧培华和金碚,2023),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创新绩效(Yang 等,2025),特别是低创新水平国家企业在并购高创新水平国家企业后,并购发起方的创新绩效提升往往会更加明显(Hsu 等,2021)。但跨境并购对研发投入的提升也被证明仅存在于企业开发性研发投入中,而探索性研发投入反而可能因跨境并购的发生而减少(Wu 等,2024)。此外,跨境并购还被证明能够推动发起方所在国家更深度嵌入全球创新网络,获得技术影响力的持续提升(刘威和高小莉,2025)。

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可以看出,虽然当前已有一些研究就市场开放与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但相关文献主要集中在企业“引进来”层面,较少有文献对企业“走出去”进行研究。此外,当前有关跨境并购创新驱动效应的研究仍主要聚焦在企业研发投入与创新绩效层面,尚未进一步延伸至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探讨。因此,跨境并购与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关系尚存在较大研究空缺。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跨境并购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

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要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因此,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点在于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周文和许凌云,2023)。长期以来,中国采取“以市场换技术”的策略,以国内市场规模及要素成本优势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从而对国外先进技术进行引进。但近年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主导了一系列逆全球化政策,严重钳制了中国境外技术引进,使得通过“引进来”这一单一渠道实现技术跃升的发展模式可能不再奏效。在这一阶段,主动“走出去”,通过跨境并购将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进行整合,将成为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方式。一方面,跨境并购优化

了企业跨境二元法人结构,使其能够突破国际技术封锁、吸收境外先进研发要素(Hsu等,2021);另一方面,跨境并购可以完善企业市场布局、填补产业链空缺(臧培华和金碚,2023),从而提升企业的抗风险能力,使其敢于增加风险较大的突破式创新投入。因此,跨境并购能够提升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Du等,2022),驱动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从而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据此,本文提出:

假说1 跨境并购能够促进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

(二)跨境并购、国际创新合作与企业新质生产力

在逆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社会对中国重要领域技术出口具有严格限制,导致中国企业陷入“技术孤岛”。与国际先进技术链的长期脱轨会产生知识封锁和能力隔离,会阻碍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余鹏翼等,2022),进而制约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通过跨境并购,中国企业不仅可以直接获得目标方的知识产权和研发人员等技术资源,快速掌握关键核心技术的实现原理和产品生产工艺(Cheng和Yang,2017),而且能够实现主体互换,使原本因忌惮出口管制处罚和实体清单连带限制的境外机构可以绕过监管红线与中国企业进行研发合作(胡旭博和原长弘,2022)。同时,跨境并购还能够大幅提高中国企业的国际知名度(臧培华和金碚,2023),帮助中国企业融入东道国的创新合作生态(刘威和高小莉,2025),使其深度嵌入到国际创新产业链,从而获得更多与境外高水平机构开展研发合作的机会,以及获得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所需设备与原材料的国际供应,进而有助于中国企业摆脱传统“引进式”的技术发展模式,完成后发技术追赶(吴先明和苏志文,2014),进而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据此,本文提出:

假说2 跨境并购会通过加强国际创新合作促进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

(三)跨境并购、组织韧性与企业新质生产力

相较于一般技术创新,关键核心技术的研发路线具有非连续性和复杂性特点,投入周期较长,需要企业能够在高不确定性环境中保持较强的风险抵御能力、环境适应能力和危机反弹能力(胡旭博和原长弘,2022)。这意味着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具有强大的组织韧性作为支撑(毕晓方等,2025)。首先,跨境并购使企业获得与东道国金融机构开展合作的机会,并向市场传递企业将获得新的客户资源与销售渠道的信号,这预示着企业未来业绩可能会大幅增长,因此会提升市场对企业的信心,进而增强企业的外源融资能力(Tao等,2017)。融资能力增强使企业财务更具灵活性,因此能够降低外部冲击发生时企业的资金链断裂风险。其次,跨境并购会在短时间内提升企业的海外市场份额(万筱雯和杨波,2022),帮助企业实现营收的全球多元化布局,使其摆脱对单一市场的周期依赖,实现经营风险分散。最后,通过跨境并购,企业能够吸收国际先进的公司治理经验(Albuquerque等,2019),帮助企业增强应对内外部风险的决策效率与管控能力。因此,跨境并购会提升企业的组织韧性,从而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据此,本文提出:

假说3 跨境并购会通过提升组织韧性促进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

(四)“引进来”与“走出去”的协同效应

“引进来”与“走出去”是对外开放政策指导下的两项基本方针，是基于改革开放理论和经济全球化逻辑形成的一体化政策，两者在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协同作用。“引进来”作为先导性政策，为国内企业高质量“走出去”奠定了基础(李磊等, 2024)。首先，在封闭的市场环境中，国内企业缺少与境外市场主体的接触机会，导致企业缺乏国际化视野与商业思维模式。信息不对称会增加企业的市场准入成本(Kacperczyk等, 2021)。企业“引进来”政策的实施便利了国内外企业间的交流合作，能够为国内企业带来高时效性的国际市场信息和丰富的跨国投资经验，降低了国内企业对外投资的信息搜集成本(李磊等, 2024)。这有助于企业获得高质量跨境并购的机会，减少资源协同效果较差的低效并购，从而提升跨境并购的资源转移与融合效率，增强跨境并购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促进效果。其次，企业进入海外市场存在适应过程(Du等, 2022)，常常因不熟悉东道国制度环境而产生“外来者劣势”(Sethi和Guisinger, 2002)。在扩大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为了缩小国内在知识产权、环境保护、监管一致性等环节与全球高标准经贸规则间的差距，政府会吸收、引进国际行业准则和监管方案，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准则对接(裴长洪和倪江飞, 2024)。这有助于减少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对国际标准的适应过程，降低跨境并购中的市场摩擦，使企业能够更好地发挥跨境并购所产生的资源协同效应，从而更快速地发展新质生产力。最后，市场开放是双向的，允许境外资本进入国内市场，一定程度上也会减少其他国家对中国企业进入的限制(方鸣和谢敏, 2021)。开放程度提升一方面能够降低跨境并购成本(周杰等, 2012)，另一方面也能帮助并购发起方更顺利地融入原本难以涉足的东道国产业(卞雨晨, 2026)，从而在更大程度上发挥跨境并购的资源整合功能，提升跨境并购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据此，本文提出：

假说4 “引进来”政策的实施能够强化跨境并购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

三、研究设计

(一)计量模型

为了验证跨境并购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本文基于中国企业的跨境并购案例构建一个准自然实验。本文将在样本区间内完成了跨境并购的企业作为处理组，其余企业作为控制组，并通过式(1)所示的多时点 DID 模型进行实证检验。

$$Nqpf_{i,t} = \alpha_0 + \alpha_1 MA_{i,t} + \sum_k \alpha_k X_{k,i,t} + \mu_i + \eta_t + \varepsilon_{i,t} \quad (1)$$

式(1)中， $Nqpf_{i,t}$ 为被解释变量企业新质生产力， $MA_{i,t}$ 为核心解释变量跨境并购， $X_{i,t}$ 为控制变量， α_0 为常数项； α_1 为跨境并购的回归系数，是该模型的重点关注系数； μ_i 为个体固定效应， η_t 为年份固定效应， $\varepsilon_{i,t}$ 为残差。

跨境并购需要企业具有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管理人才和广泛的商业网络,拥有这些资源禀赋优势的企业,其新质生产力发展可能本就比较快。此类可观测因素的遗漏会使跨境并购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检验出现伪回归。为了消除这一影响,本文使用PSM方法对样本进行预处理,按照1:1的比例进行半径为0.03的最近邻匹配,匹配所使用的协变量为基准模型所使用的控制变量。图1显示,在经过PSM处理后,处理组和控制组的倾向得分分布相似度大幅提升,已基本重合,说明组间可观测因素差异已得到大幅缓解,自选择偏差的影响有效降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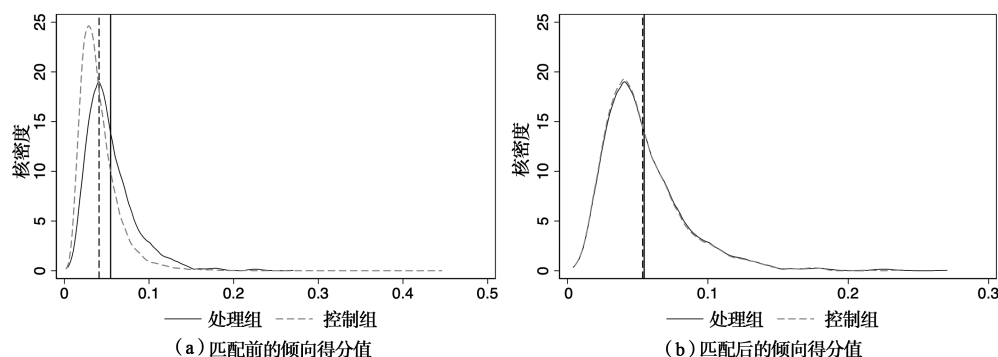


图1 倾向得分概率分布

(二) 样本选择与数据处理^①

本文所使用的跨境并购案例来自BVD-Zephyr全球并购交易数据库。考虑到中国部分企业会出于税费、监管环境和上市成本等因素前往“避税天堂”注册,这些企业虽属于境外企业,但其中很多企业主要在中国境内开展业务,未深度嵌入世界产业链之中。为了排除这一现象对实证结果的影响,本文剔除了对注册地在“避税天堂”^②企业进行并购的案例。此外,在案例通报中,一些企业或机构会发布虚假并购信息以实现资本市场监管等目的,而最终企业并未实际完成并购,因此本文仅保留数据库中完成状态为“已完成(Completed)”的案例。

本文以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剔除了金融类企业、ST和*ST企业以及数据严重缺失的企业。参照储德银和程扬帆(2025)、Chen等(2025)的做法,本文选择2011—2023年作为样本区间,期间完成跨境并购的企业共174家。此外,对于在同一年完成多次跨境并购的企业,本文优先保留其并购比例最高和并购金额最大的案例。实证所使用的其他微观数据主要来自Wind数据库、CSMAR数据库和CNRDS数据库,个别缺失数据由作者根据企业年报手工整理进行补充。为了避免异常值对实证结果产生影响,本文还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双边1%的缩尾处理。

^①资料来源:BVD-Zephyr数据库, <https://zephyr.bvdinfo.com> (访问日期2025-01-22); Wind数据库, <https://www.wind.com.cn> (访问日期2025-01-22); CSMAR数据库, <https://data.csmar.com> (访问日期2025-01-22); CNRDS数据库, <https://www.cnrds.com> (访问日期2025-01-22)。

^②“避税天堂”包括百慕大群岛、开曼群岛和维尔京群岛(英属)。

(三) 变量定义与测度^①

1. 被解释变量：企业新质生产力(*Nqpf*)

生产力是生产要素按照一定形式和比例结合构建的生产力系统(任保平, 2024), 因此科学测度企业新质生产力需综合考虑企业各生产要素的组合。本文参考陈彦霖等(2025)、梁孝成等(2025)、徐子尧等(2025)的做法, 并综合考虑数据的连续性、可得性和准确性, 筛选出在企业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四个层面共 19 个与企业新质生产力相关的子指标, 并通过熵权法对其进行合成。具体而言, 在企业新质劳动者层面, 选取企业技术研发人员占比、高学历人员占比、具有研发背景的高管占比和高学历高管占比作为子指标; 在企业新质劳动资料层面, 选取研发投入、人工智能采纳度、数字化转型、数据资产、制造费用占比、固定资产占比和无形资产占比作为子指标; 在企业新质劳动对象层面, 选取绿色技术研发、研发对象技术含量、工业机器人研发和数字技术研发作为子指标; 在三种要素的优化组合层面, 选取 ESG 表现、创新效率、供应链效率和总资产周转率作为子指标^②。

2. 核心解释变量：跨境并购(*MA*)

本文使用多时点 DID 模型进行实证检验, 因此跨境并购使用虚拟变量表示。对于处理组企业, 该虚拟变量在企业完成跨境并购之前赋值为“0”, 完成跨境并购之后赋值为“1”; 对于控制组企业, 该虚拟变量始终赋值为“0”。

3. 控制变量

本文参照梁孝成等(2025)的做法, 选取控制变量, 具体包括经营性现金流(*Cf*)、非债务税盾(*Ndts*)、资产规模(*Size*)、盈利能力(*Profit*)、杠杆率(*Lev*)、企业存续时间(*Age*)、董事会规模(*Bs*)、独立董事占比(*Idr*)、两职合一(*Dual*)、机构持股比例(*Inst*)、大股东持股比例(*Top1*)。各变量的具体说明见表 1。

表 1 变量定义与说明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说明
企业新质生产力	<i>Nqpf</i>	基于 19 个子指标, 通过熵权法合成的新质生产力指数
跨境并购	<i>MA</i>	企业完成跨境并购后赋值为“1”, 否则赋值为“0”
经营性现金流	<i>Cf</i>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总资产
非债务税盾	<i>Ndts</i>	折旧摊销/总资产
资产规模	<i>Size</i>	总资产的对数形式
盈利能力	<i>Profit</i>	净利润/总资产

^①篇幅所限,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检验未展示, 备案。凡备案资料均可登录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术刊物编辑部网站“在线阅读”栏目查询、下载。

^②篇幅所限, 各子指标的具体测度方法、权重、数据来源及主要参考文献未展示, 备案。

续表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说明
杠杆率	<i>Lev</i>	总负债/总资产
企业存续时间	<i>Age</i>	成立时长的对数形式
董事会规模	<i>Bs</i>	董事会人数的对数形式
独立董事占比	<i>Idr</i>	独立董事人数/董事会总人数
两职合一	<i>Dual</i>	董事长兼任总经理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
机构持股比例	<i>Inst</i>	机构股东持股比例
大股东持股比例	<i>Top1</i>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四、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一) 基准模型检验

表 2 为基准模型检验结果。列(1)为单变量回归，其中跨境并购(*MA*)的系数为 0.004 5，且在 1%水平上显著。列(2)中加入了可能影响企业新质生产力的控制变量，结果显示跨境并购(*MA*)的系数为 0.004 9，且在 1%水平上显著，表明跨境并购能够促进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至此，假说 1 得到验证。

并购目标资源禀赋的差异会影响跨境并购的资源协同效果，从而可能改变跨境并购与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关系。因此，本文还将进一步就不同类型跨境并购的影响进行比较分析。首先，跨境并购主要存在技术寻求、市场寻求和自然资源寻求三类目的。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是实现新质生产力跃升的主要途径，因此跨境并购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促进作用可能主要来自技术寻求型跨境并购。为了对此进行验证，本文参照申明浩等(2024)的做法，将对技术资源丰富地区的并购视作技术寻求型跨境并购^①，将市场及自然资源丰富地区的并购视作非技术寻求型跨境并购进行进一步检验。表 2 列(3)和列(4)中，技术寻求型跨境并购(*MA_Tec*)的系数显著大于 0，但非技术寻求型跨境并购(*MA_NonTec*)的系数不显著。其次，对于所属相同行业的企业，其内部资源具有相似性，因此对同行业企业进行并购的作用主要是巩固企业行业地位，实现规模经济，但对企业技术资源缺口的填补作用较小；对于所属不同行业的企业，其技术特点存在较大差异，进行跨行业并购能够实现资源互补，发挥资源协同效应，更可能推动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因此，本文还根据跨境并购是否为跨行业并购进行进一步检验。列(5)和列(6)中，跨行业跨境并购(*MA_Inter*)的系数显著大于 0，但同行业跨境并购(*MA_Intra*)的系数不显著。上述结果表明，只有技术寻求型跨境并购和跨行业跨境并购能够促进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

^①技术资源丰富地区包括欧盟 27 国、美国、加拿大、新加坡、日本、韩国、新西兰、英国、瑞士、挪威。

表 2 基准模型检验结果

项目	(1)	(2)	(3)	(4)	(5)	(6)
	<i>Nqpf</i>	<i>Nqpf</i>	<i>Nqpf</i>	<i>Nqpf</i>	<i>Nqpf</i>	<i>Nqpf</i>
<i>MA</i>	0.004 5 *** (5.488 8)	0.004 9 *** (10.055 4)	—	—	—	—
<i>MA_Tec</i>	—	—	0.006 5 *** (7.608 8)	—	—	—
<i>MA_NonTec</i>	—	—	—	-0.000 8 (-0.782 1)	—	—
<i>MA_Inter</i>	—	—	—	—	0.004 9 *** (4.311 8)	—
<i>MA_Intra</i>	—	—	—	—	—	0.001 4 (0.670 0)
控制变量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1 740	1 740	1 345	1 078	774	1 369
调整 R ²	0.683 6	0.688 5	0.684 6	0.666 8	0.752 4	0.650 2

注：括号内为估计参数的 t 统计量，*、** 和 *** 分别表示估计系数在 10%、5% 和 1% 的水平上显著。下表同。

(二) 稳健性与内生性检验^①

1. 平行趋势假设评估

使用 DID 模型需保证处理组与控制组间具有良好的事前平行趋势。在本文中，处理组企业在进行跨境并购前，其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应与控制组企业不存在显著差异。本文使用事件研究法对平行趋势假设进行评估。为了避免远期处理样本较少导致估计偏误，本文按照文献常见做法对事件窗口进行归并，保留前后 7 期的检验结果，其中-1 期作为基期被移除。图 2 显示，在企业完成跨境并购前，置信区间均包含 0，代表处理组和控制组企业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在这一时期不具有显著差异，表明本文研究满足具有事前平行趋势的基本假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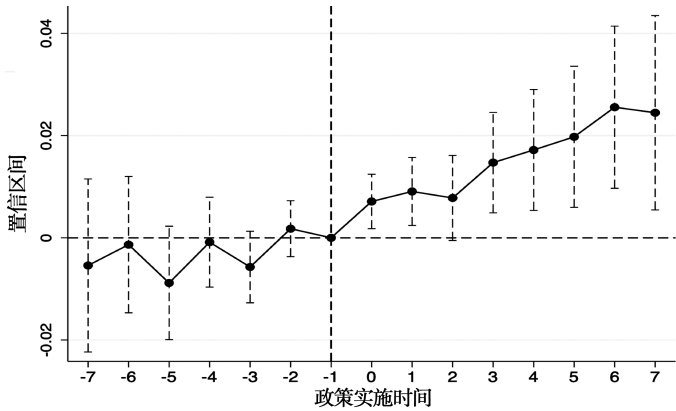


图 2 平行趋势假设评估结果

^①篇幅所限，完整的稳健性与内生性检验结果未展示，备案。

2. 对跨境并购非随机性的进一步处理

(1) 由于跨境并购并非一个严格意义上的随机事件，有能力进行跨境并购的企业可能本身就处于生产力发展的上升期，因此样本可能存在自选择偏差。虽然本文对样本进行了 PSM 处理，但由于协变量选择具有主观性，因此自选择偏差无法被完全消除。对此，本文首先使用 Honest DID 模型对平行趋势检验中跨境并购发生后的估计系数进行敏感性分析。具体而言，本文假设两组企业新质生产力存在一倍标准误的最大偏离幅度 (Mbar)，并计算估计系数在最大偏离幅度下的置信区间。图 3 显示，置信区间始终不包含 0，表明处理发生后两组企业新质生产力出现的差异并非完全由处理组企业自身生产力上升速度更快所导致，而是受到了跨境并购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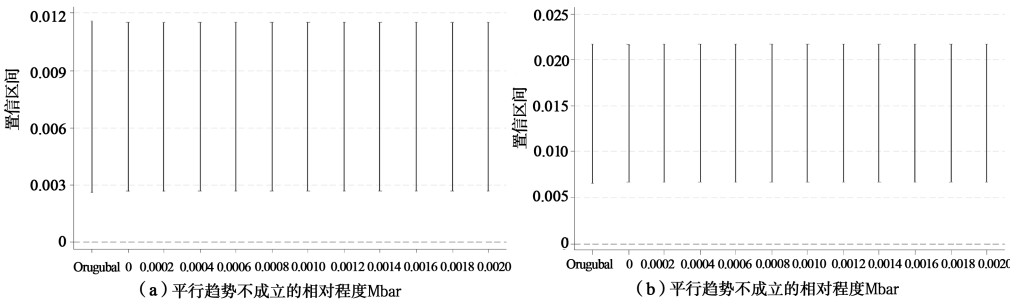


图 3 敏感性分析结果

(2) 参照方红生等 (2025) 的做法，本文将可能影响企业跨境并购的因素基期值与时间趋势项的交互项加入控制变量。对于可能影响企业跨境并购因素的选择：一是参照方红生等 (2025) 的做法，基于基期样本，以划分处理组与控制组的虚拟变量为被解释变量，以基准模型中的控制变量为解释变量，使用 logit 模型进行回归，将回归结果中系数显著的变量视作会影响跨境并购的因素；二是根据宋林和彬彬 (2016) 的做法，将资产规模和杠杆率视作会影响跨境并购的因素；三是考虑双向因果关系，将企业新质生产力视作会影响跨境并购的因素。在控制了这些因素基期值与时间趋势的交互项后，跨境并购 (MA) 的系数依旧显著大于 0。

(3) 进一步使用 Heckman 两阶段模型克服自选择偏差的影响，具体分为两步：第一步，使用 Probit 模型对跨境并购 (MA) 概率进行估计，由于跨境并购具有一定行业特征，同行业公司为保持竞争力，可能会出现模仿并购行为，但同行业公司跨境并购的平均水平不会直接影响单个企业的新质生产力，因此本文使用同行业公司跨境并购平均水平 (MA_mean) 作为外生排除性变量；第二步，将第一步回归得到的逆米尔斯比率 (Imr) 加入跨境并购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基准回归模型中。结果显示，逆米尔斯比率 (Imr) 的系数不显著，表明本文关于跨境并购与企业新质生产力关系的检验未显著受到自选择偏差的影响。

3. 传统 DID 模型的异质性处理效应

不同企业进行跨境并购时点的差异可能会引起异质性处理效应。为了避免这一问题的影响,本文借鉴 Callaway 和 Sant'Anna(2021)的做法,通过计算组别和时期层面的平均处理效应,并将其进行加权加总,从而得到修正后的平均处理效应。结果显示,修正后的平均处理效应(MA_simple)的系数依旧显著大于0。此外,本文还对跨境并购的时间平均处理效应($MA_calendar$)、组别平均处理效应(MA_group)和事件平均处理效应(MA_event)进行了估计,其系数也显著大于0^①。以上结果表明,在克服跨时期处理效果差异问题后,跨境并购对企业新质生产力依旧表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

4. 其他稳健性及内生性检验

(1)安慰剂检验。随着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中国企业可能会自发地对生产要素进行升级,从而使其新质生产力水平得到提升。这意味着跨境并购可能并非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真正推动因素。为了确保跨境并购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影响的检验结果不具随机性,本文将处理组企业按原数量随机重置,并为其随机分配并购完成时间,从而构造出虚假的跨境并购解释变量重新进行回归。在将上述过程重复1000次后发现,虚假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显著异于真实值,说明企业新质生产力的提升受到了跨境并购的影响,并非完全来自未观测到的随机因素冲击。

(2)双重机器学习方法。为了克服多重共线性和模型设定偏误等问题的影响,本文使用 Ahrens 等(2024)提出的双重机器学习方法对跨境并购与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因果关系进行重新识别。具体而言,本文调用 Python 中的 Scikit-learn 机器学习库,分别使用随机森林、梯度提升和索套算法进行拟合与求解,将25%的样本作为训练集,其余作为测试集。结果显示,跨境并购(MA)的系数依旧显著大于0。

(3)使用更高维度的固定效应。在样本区间内,一些企业的所属行业和所处地区发生了改变,意味着行业与地区并非企业不随时间改变的个体特征。行业和地区在周期上的波动势必会对企业新质生产力产生影响,这部分影响不会被个体固定效应完全吸收。为了排除该问题的影响,本文进一步将年份—行业与年份—省份层面的固定效应加入模型。结果显示,跨境并购(MA)的系数依旧显著大于0。

(4)对核心变量进行重新构造。首先,本文使用 CSMAR 数据库中基于劳动力和生产工具视角测算的企业新质生产力指数进行回归;其次,本文使用跨境并购金额作为跨境并购的代理变量;最后,本文对企业跨境并购案例进行进一步筛选,剔除发生多次跨境并购的企业、剔除对港澳台地区企业进行跨境并购的案例,以及剔除并购比例低于10%的案例。在对变量进行重新构造后,跨境并购(MA)的系数依旧显著大于0。

(5)更换样本。首先,考虑到制造业企业技术密集度高,创新驱动力强,在研究企业新质生产力问题中具有代表性,本文仅保留制造业企业样本;其次,为了提升数

^①文中报告的事件平均处理效应是事件处理后的平均效应,而事件处理前的平均效应系数 p 值大于0.1。这一检验结果对事前平行趋势假设提供了进一步的支撑(陈强等,2025)。

据质量，本文剔除关键变量数据连续存续不足 5 年的企业样本；最后，本文重新按照 1：3 的比例进行 PSM 匹配。更换样本后，跨境并购(MA)的系数依旧显著大于 0。

(三) 传导渠道检验

为了揭示跨境并购促进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传导渠道，本文构建式(2)和式(3)所示的中介效应检验模型进行分析。

$$M_{i,t}=\beta_0+\beta_1MA_{i,t}+\sum_k\beta_kX_{k,i,t}+\mu_i+\eta_t+\varepsilon_{i,t}$$
 (2)

$$Nqpf_{i,t}=\gamma_0+\gamma_1M_{i,t}+\gamma_2MA_{i,t}+\sum_k\gamma_kX_{k,i,t}+\mu_i+\eta_t+\varepsilon_{i,t}$$
 (3)

式(2)和式(3)中， $M_{i,t}$ 代表机制变量，包括国际创新合作(IIC)和组织韧性(Resilience)：①国际创新合作(IIC)，以企业与境外机构联合申请专利数量占比作为代理变量；②组织韧性(Resilience)，首先参照沈路和钞小静(2025)的做法，将组织韧性解构为组织发展的波动性和增长性，前者使用企业股票月回报率的波动率表示，后者使用企业五年内主营业务收入的累计增加额表示，其次参照田丹等(2025)的做法，以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反映企业抵御冲击和从冲击中恢复的能力，最后使用熵权法将上述三个子指标合成为代表企业组织韧性的综合指标。表 3 列(1)中跨境并购(MA)的系数和列(2)中国际创新合作(IIC)的系数分别为 0.001 7 和 0.013 1，且均在 5%水平上显著，表明跨境并购显著增加了企业的国际创新合作，而国际创新合作增加则起到了促进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因此存在“跨境并购→国际创新合作→企业新质生产力”的传导渠道。列(3)中跨境并购(MA)的系数和列(4)中组织韧性(Resilience)的系数分别为 0.004 2 和 0.116 0，且均在 10%水平上显著，表明跨境并购显著提升了企业的组织韧性，而组织韧性提升则起到了促进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因此存在“跨境并购→组织韧性→企业新质生产力”的传导渠道。至此，假说 2 和假说 3 得到验证。

表 3 传导机制检验结果

项目	(1)	(2)	(3)	(4)
	IIC	Nqpf	Resilience	Nqpf
MA	0.001 7** (2.271 7)	0.007 9** (3.099 8)	0.004 2* (1.839 7)	-0.003 7 (-1.163 2)
IIC	—	0.013 1** (2.317 9)	—	—
Resilience	—	—	—	0.116 0* (1.801 7)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年份效应	是	是	是	是
个体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615	513	354	317
调整 R ²	0.090 1	0.728 0	0.853 8	0.888 7

(四)“引进来”与“走出去”的协同作用检验

为了进一步验证“引进来”与“走出去”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所产生的协同作用，本文将负面清单制度这一企业“引进来”的代表性政策与跨境并购的交互项纳入基准模型，构建式(4)所示的拓展模型进行分析。

$$Nqpf_{i,t} = \varphi_0 + \varphi_1 MA_{i,t} + \varphi_2 Nls_{i,t} + \varphi_3 Nls \times MA_{i,t} + \sum_k \varphi_k X_{k,i,t} + \mu_i + \eta_t + \varepsilon_{i,t} \tag{4}$$

式(4)中， $Nls_{i,t}$ 代表负面清单制度，使用企业所在地区是否实施了负面清单制度表示，若企业所在地区实施了负面清单制度，变量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表 4 中，交互项 ($Nls \times MA$) 的系数为 0.004 5，且在 1% 水平上显著，与基准模型检验结果中跨境并购 (MA) 的系数符号相同，表明负面清单制度正向调节了跨境并购与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关系，即“引进来”政策的实施会增强跨境并购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至此，假说 4 得到验证。

表 4 “引进来”与“走出去”的协同作用检验结果

项目	<i>Nqpf</i>
<i>MA</i>	0.002 6 *** (3.442 6)
<i>Nls</i>	-0.007 2 *** (-3.145 5)
<i>Nls</i> × <i>MA</i>	0.004 5 *** (3.921 1)
控制变量	是
年份效应	是
个体效应	是
样本量	1 740
调整 R ²	0.689 0

(五)异质性分析

(1)良好的内部控制体系有助于企业在并购完成后快速适应目标方的治理结构和东道国监管准则，从而高效地将外部资源内部化利用。相反，对于内部控制质量较差的企业，在并购发生后可能会因管理架构变动导致决策机制瘫痪，产生治理真空期，从而会影响企业的资源整合效率，进而影响新质生产力发展。对此，本文根据企业是否存在内部控制缺陷将样本划分为内部控制质量较好与较差的企业。表 5 列(1)和列(2)分别报告了两组的检验结果，仅有内部控制质量较好的企业组跨境

并购(MA)的系数显著大于 0。这表明,跨境并购对新质生产力的促进作用主要存在于内部控制质量较好的企业。

(2)供应链集中度较高的企业与上下游具有明显的技术绑定特征,在发展新质生产力时面临路径依赖与效率边界约束。跨境并购能够帮助这类企业融入更加多元化的世界供应链,从而快速突破地理边界和技术壁垒,实现关键性技术突破,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对此,本文参考薛爽等(2018)的做法,使用企业前五大供应商、客户采购销售比例之和的均值测度企业供应链集中度,并根据其中位数对样本进行划分,将高于中位数的划分为供应链集中度较高的企业,反之划分为供应链集中度较低的企业。表 5 列(3)和列(4)分别报告了两组的检验结果,仅有供应链集中度较高企业组跨境并购(MA)的系数显著大于 0。这表明,跨境并购对新质生产力的促进作用主要存在于供应链集中度较高的企业。

(3)企业跨境并购的资源协同效果可能与企业垄断地位有关。对于垄断力量较强的企业,其本身就具有行业领先的技术资源和较强的组织韧性,跨境并购主要起到进一步巩固市场地位的作用。而垄断力量较弱的企业一般是行业中的技术追赶者,跨境并购对其内部技术短板的补充和组织韧性的提升在其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会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对此,本文使用勒纳指数^①测度企业垄断力量,并根据指数中位数对样本进行划分,将指数大于中位数的企业划分为垄断力量较强的企业,反之划分为垄断力量较弱的企业。表 5 列(5)和列(6)分别报告了两组的检验结果,仅有垄断力量较弱的企业组跨境并购(MA)的系数显著大于 0。这表明,跨境并购对新质生产力的促进作用主要存在于垄断力量较弱的企业。

表 5 异质性检验结果

项目	(1)	(2)	(3)	(4)	(5)	(6)
	内部控制 质量较好	内部控制 质量较差	供应链集 中度较高	供应链集 中度较低	垄断力量 较强	垄断力量 较弱
	<i>Nqpf</i>	<i>Nqpf</i>	<i>Nqpf</i>	<i>Nqpf</i>	<i>Nqpf</i>	<i>Nqpf</i>
MA	0.006 4 *** (6.338 9)	-0.003 5 (-0.817 1)	0.008 4 *** (4.512 4)	-0.002 1 (-1.373 4)	0.004 0 (1.620 7)	0.006 4 *** (3.352 2)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1 027	490	771	856	871	729
调整 R ²	0.643 0	0.791 5	0.746 0	0.662 7	0.708 1	0.730 2

^①勒纳指数=(营业收入-营业成本-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营业收入。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基于 BVD-Zephyr 全球并购交易数据,以 2011—2023 年 A 股上市企业为样本,利用 PSM-DID 模型,系统地揭示了跨境并购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一,跨境并购能够促进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并且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与内生性检验后依旧成立;第二,仅有技术寻求型跨境并购和跨行业跨境并购能够促进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第三,增加国际创新合作和提升组织韧性是跨境并购促进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主要机制,即存在“跨境并购→国际创新合作/组织韧性→企业新质生产力”的传导渠道;第四,企业“引进来”与“走出去”具有协同效应,“引进来”政策的实施能够增强跨境并购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促进作用;第五,跨境并购对新质生产力的促进作用主要存在于内部控制质量较好、供应链集中度较高和垄断力量较弱的企业。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得出如下政策启示:

(1)对于政府来说,要进一步完善市场开放政策,鼓励企业通过跨境并购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进行整合。首先,可以为企业跨境并购提供财政上的支持,例如给予跨境并购企业税收优惠,或为其提供跨境投资贷款、专项基金和资产证券化等方面的金融服务,为企业跨境并购融资提供便利,以此提升企业跨境并购的积极性。其次,要增强对企业跨境并购的服务保障,例如可以联合国际行业协会和商会组织搭建跨境并购信息服务平台,同时明确并简化资金出境的审批流程,在必要时可以为企业派驻具有国际投资经验的谈判专家,帮助企业完成跨境并购。最后,要处理好企业“引进来”与“走出去”的关系,进一步削减负面清单事项,扩大自贸区范围,以制度型开放带动企业进行高质量跨境并购。

(2)对于企业来说,要抓住市场开放机遇,主动“走出去”开拓国际市场,发展新质生产力。首先,要积极参加各类国际行业论坛,或通过路演等方式向国际企业展示自身的资金实力、市场优势和合作前景,以此寻求适合的跨境并购机会。其次,可以组建专门的跨境并购业务部门或团队,聘请熟悉东道国市场准则和法律体系的律师、财务专家和投资顾问对东道国的宏观经济形势、行业动态以及目标企业基本面等方面进行全面评估。最后,在对并购对象进行选择时,要考虑自身的资源缺口,优先进行技术寻求型和跨行业的跨境并购。特别是对于内部控制质量较好、供应链集中度较高和垄断力量较弱的企业,要充分考虑自身资源禀赋特点开展跨境并购,对国内外技术资源进行整合,加速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以此提升新质生产力水平。

[参考文献]

- [1]毕晓方,李端,柳永天,等.组织韧性视角下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新质生产力提升的组态研究[J].管理科学,2025,38(2):13-27.

- [2]卞雨晨. 境外耐心资本与企业新质生产力: 兼论制度型开放的意义[J]. 国际金融研究, 2026(3): 62-74.
- [3]陈强, 齐霁, 颜冠鹏. 双重差分法的安慰剂检验: 一个实践的指南[J]. 管理世界, 2025, 41(2): 181-220.
- [4]陈彦霖, 阳镇, 梅亮. “数字基建”与企业新质生产力——基于“宽带中国”试点政策的评估[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25, 46(10): 120-133.
- [5]陈邑早, 解纯慧, 王圣媛, 等. 放宽市场准入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研究[J]. 科研管理, 2024, 45(12): 19-28.
- [6]储德银, 程扬帆. 减税政策类型、营商环境优化与企业新质生产力[J]. 财贸经济, 2025, 46(12): 60-76.
- [7]方红生, 夏恺楠, 胡稳权, 等. 政府采购数字化与经济增长: 来自政府采购云平台的证据[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25, 42(10): 48-69.
- [8]方鸣, 谢敏.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资本市场发展: 历史回溯、理论探索与实践趋向[J]. 上海经济研究, 2021(8): 5-15+28.
- [9]胡旭博, 原长弘. 关键核心技术: 概念、特征与突破因素[J]. 科学学研究, 2022, 40(1): 4-11.
- [10]李磊, 刘博聪, 李川川. 海外技术“引进来”与自主创新“走出去”[J]. 经济研究, 2024, 59(11): 72-88.
- [11]梁孝成, 吕康银, 陈思. 数据要素市场化对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的影响研究[J]. 科研管理, 2025, 46(2): 12-21.
- [12]刘海月, 李方华, 王以勒. “走出去”与企业新质生产力提升——基于上市公司 OFDI 的经验证据[J]. 国际经贸探索, 2025, 41(7): 72-91.
- [13]刘威, 高小莉. 跨国并购、全球创新网络嵌入与技术影响力[J]. 世界经济研究, 2025(6): 53-67+135-136.
- [14]刘伟. 科学认识与切实发展新质生产力[J]. 经济研究, 2024, 59(3): 4-11.
- [15]裴长洪, 倪江飞. 我国制度型开放与自由贸易试验区(港)实践创新[J]. 国际贸易问题, 2024(3): 1-14.
- [16]任保平. 生产力现代化转型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逻辑[J]. 经济研究, 2024, 59(3): 12-19.
- [17]申明浩, 刘奕妍, 谭伟杰. 媒体 ESG 关注与企业数字型跨国并购[J]. 世界经济研究, 2024(7): 72-90+135.
- [18]沈路, 钞小静. 人工智能对制造业企业韧性的影响机制及其供应链溢出效应研究[J]. 南开经济研究, 2025(5): 271-288.
- [19]宋林, 彬彬. 我国上市公司跨国并购动因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多项 Logit 模型的实证分析[J]. 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31(5): 98-106.
- [20]田丹, 丁宝, 刘芙蓉. “耐心资本”赋能新创企业韧性: 企业风险投资和独立风险投资的差异化作用[J]. 中国工业经济, 2025(7): 156-173.
- [21]万筱雯, 杨波. 企业跨国并购与绿色创新能力: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J]. 国际贸易问题, 2022(9): 106-123.
- [22]吴开亚, 胡金, 李启元. 制度型开放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研究[J]. 科研管理, 2026, 47(5): 23-31.
- [23]吴先明, 苏志文. 将跨国并购作为技术追赶的杠杆: 动态能力视角[J]. 管理世界, 2014(4): 146-164.
- [24]徐子尧, 申程程, 张雪兰, 等. 中国上市企业新质生产力指数编制暨发展报告(2011-2022年)[J]. 金融经济研究, 2025, 40(3): 3-18.

- [25]薛爽,耀友福,王雪方. 供应链集中度与审计意见购买[J]. 会计研究, 2018(8): 57-64.
- [26]于英杰,杜德斌,李祺祥. 全球科技结构性权力分配的时空格局及影响机制——基于高端制造业价值链的视角[J]. 地理研究, 2024, 43(12): 3089-3109.
- [27]余鹏翼,李学沛,白洛凡,等. 技术获取型跨国并购的双向效应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以先进制造业为例[J]. 中国软科学, 2022(2): 116-126.
- [28]臧培华,金碚. 跨国并购与自主创新: 摆脱创新双低困境的理论机制与战略选择[J]. 上海经济研究, 2023(11): 55-70.
- [29]周杰,薛有志,吴超. 市场化进程、地区开放度与企业跨国并购[J]. 经济与管理研究, 2012(12): 110-116.
- [30]周文,许凌云. 论新质生产力: 内涵特征与重要着力点[J]. 改革, 2023(10): 1-13.
- [31]AHRENS A, HANSEN C B, SCHAFFER M E, et al. Ddml: Double/Debiased Machine Learning in Stata[J]. Stata Journal, 2024, 24(1): 3-45.
- [32]ALBUQUERQUE R, BRANDAO-MARQUES L, FERREIRA M A, et al. International Corporate Governance Spillovers: Evidence from Cross-border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J]. Th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2019, 32(2): 738-770.
- [33]CALLAWAY B, SANT'ANNA P H C.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with Multiple Time Periods[J].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2021, 225(2): 200-230.
- [34]CHEN J, CHEN F L, DAI Y F. Media Attention and Corporat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Financial Analysis, 2025, 105: 104354.
- [35]CHENG C, YANG M. Enhancing Performance of Cross-border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in Developed Markets: The Role of Business Ties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apability[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17, 81: 107-117.
- [36]DU J S, PENG Y C, TONG Y S, et al. Impact of Enterprise Ambidexterity Capability and Experience Learning on Cross-border M&A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China[J]. Oeconomia Copernicana, 2022, 13(4): 1177-1214.
- [37]HSU P H, HUANG P, HUMPHERY-JENNER M, et al. Cross-border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for Innovation[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2021, 112: 102320.
- [38]KACPERCZYK M, SUNDARESAN S, WANG T Y. Do Foreign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Improve Price Efficiency[J]. Th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2021, 34(3): 1317-1367.
- [39]SETHI D, GUISSINGER S. Liability of Foreignness to Competitive Advantage: How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Cope with th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Environment[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2002, 8(3): 223-240.
- [40]TAO F, LIU X H, GAO L, et al. Do Cross-border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Increase Short-term Market Performance? The Case of Chinese Firms[J].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017, 26(1): 189-202.
- [41]WU X M, WANG M Q, CUI V C. Are Proactive Outbound Cross-border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Effective for Firms' R&D? New Evidence from Emerging Market Enterprise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2024, 30(4): 101155.
- [42]YANG P J, HUANG J Y, GUAN C H, et al. Impact of Cross-border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on Firm Innovation Perform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ynamic Capability Theory[J]. Economics of Innovation and New Technology, 2025, 34(3): 442-468.

Can Cross-border M&A Promote Enterpris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BIAN Yuchen

(School of Finance, Nanjing Audit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1815)

Abstract: Based on the BVD-Zephyr database, this paper constructed a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DID) method, and employed a sample of A-share listed enterprises from 2011 to 2023 to empirically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ross-border M&A and enterpris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cross-border M&A can promote enterpris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echnology-seeking and cross-industry cross-border M&As mainly drive this effect. Mechanism tests indicate that increasing international innovation cooperation and enhancing 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 are the primary channels through which cross-border M&A promotes enterpris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Besid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bring-in” policy can reinforce the positive effect of cross-border M&A on enterpris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Heterogeneity analysis also indicates that the effect of cross-border M&A mainly exists in enterprises with strong internal control quality, high supply chain concentration, and weak monopolistic power. Taking cross-border M&A as the entry point, this paper contributes to the literature on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t has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enterprises to improv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Key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Cross-border M&A; International Innovation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 “Going Global”; “Bring-in”

(责任编辑 刘建昌)